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六次逐字记录

1994年10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 嗣后: 布兰丁诺·坎托先生(副主席)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嗣后: 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 嗣后: 皮里斯·巴隆先生(副主席) (乌拉圭)

上午10时30分开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 大会将首先听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阁下, 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姆维尼总统(以英语发言): 我要和在我前面讲话的其他各国国家元首一起由衷地祝贺你受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作为非洲人民杰出的儿子, 你给这一崇高的职位带来你拥有的宝贵经验、外交才能和智慧, 来领导我国人民寄予信念和希望的大会的工作。主席先生, 让我向你保证, 在你履行对人类的崇高而艰巨的职责时, 你一定能够得到坦桑尼亚全心全意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要表示, 我国代表团赞赏你的前任, 圭亚那共和国的萨米尔·因萨纳利先生阁下, 他表现了对他职责的献身精神和优秀的领导才能, 他以十分能干的方式领导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感谢另一位非洲之子, 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他跟他的秘书处一起继续十分出色地为本组织服务。秘书处需要, 也应该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对付通常是在非常艰巨的情况下其日常工作的种种挑战。

自从1985年我当选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以来, 这是我第二次出席大会的会议。我曾荣幸地在1987年10月8日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讲了话。当时我用那次机会, 以我国新总统的身份重申我国对联合国的信念, 以及我国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承诺。

今天, 我将最后一次以我国总统的身份向大会讲话。各会员国都知道, 坦桑尼亚已开始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而这些改革正在和平而谐和的气氛中取得良好的进展。

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最多不得超过两个五年。因此, 我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将于明年年底期满, 那时我们将举行我国多党民主制度下的第一次普选。为坦桑尼亚人民留下可运转的民主制, 并且让他们能在自由和公平的气氛下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是我最大的愿望。

在我准备向其他人递交领导权时, 我必须重申我国对联合国体系的一贯的信念和信任。尽管存在各种缺点, 联合国仍然是和我们一样的穷国和弱国的唯一希望, 因为我

们只有通过联合国毫无恐惧地提出我们对人类发展、世界和平、公正和平等的关切。联合国体系的缺陷与《宪章》所载的原则无关；相反，它们是会员国行动与否的产物。

在这方面，我们十分高兴地向所有新会员国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的祝贺。它们的加入使我们更接近我们所珍视的联合国普遍成员的目标。我们保证继续与所有国家密切合作以使我们的世界成为全人类更美好的地方。

在我任坦桑尼亚总统期间，世界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些变化给我们带来希望，有些则不然。我们关于冷战后时期会为本组织促进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新动力的希望还未能实现。所谓的和平红利没有扩散到那些最需要它的地方，即人类最穷困的区域。可惜的是，全球性的紧张局势被区域性和国家的冲突所代替，给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不论是在发展或安全问题上，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得到什么喘息。

《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运转不总是使许多会员国感到满意。这是因为一些会员国过去曾不愿执行《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相反，利用漏洞和借口为其违反《宪章》精神的行动辩护。在联合国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都有必要重新献身于《宪章》所载的目标与理想。这包括有必要使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所有会员国，并且更为民主化。虚伪而嘲弄民主理想的是，一些会员国向其他国家极力地鼓吹民主，而自己却未接受联合国体系的全面民主化。

这个问题在冷战后的时代尤其紧迫。世界力量新型关系的出现既可以是资产也可以是负担，这要取决于所有会员国是否有加强这个世界机构的代表性和民主传统的政治意愿。如果有这种政治意愿，我可以肯定我们能在许多会员国所希望的有关再次审查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权力和成员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我可以同样地肯定，如果我们大家有改善联合国体系的政治意愿，我们便可以更快地就加强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权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两个机构是本组织集中地处理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现实和紧迫问题的重要机构。

秘书长在向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的全面性报告中提醒我们注意联合国在变化的国际情况下的维持和平作用。在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职责增加的同时，执行这些职责的手段无法跟上新的要求。现有80 000多文职和军事人员

在世界范围内为17个维持和平行动服务，本组织需要满足有关费用的新承诺。

我们都应努力地遵守支付联合国维持和平开支的财政分摊义务。我们必须防止落到由那些可以自己支付这种费用的会员国训练和部署人员的地步。这种局面不但会使维持和平成为少数富国的垄断，并且也将是对我们所珍视的普遍参与的原则的致命打击。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加拿大上周在本届会议提出的关于成立一支永久性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建议。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也有着这个想法，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在日益危险的情况下在实地尽忠职守和坚韧不拔的联合国人员表示致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坦桑尼亚人已经以身殉职。我们哀悼他们。更多的人受了伤。他们应该得到我们衷心的同情。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必须继续是一个优先项目，我们支持为保护他们而制订国际条约的所有主动行动。

坦桑尼亚作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邻国深入地参加了在这两个动荡国家谋求和平与和解的工作。去年，我们非洲各国家元首曾在开罗决定，时机已到，非洲人应该负起在其大陆防止、处理和解决冲突的责任，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可能很穷，但是我们的贫穷没有延引到人性、尊严和智慧的领域。

在卢旺达和布隆迪，我们曾经抱有很高的希望，当时我们认为，终于找到了解决其当地问题的永久办法。就布隆迪而言，1993年7月进行的选举是一个高潮，国际观察员已宣布这次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从布约亚总统向已故的恩达达耶总统的权力过渡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布隆迪人民选择领导他们的这个人不仅体现了布隆迪和平、统一与和解的希望，而且还体现了我们次区域一个和平、稳定和合作新时代的曙光。

但是，军方的一些人却决定把其自己的狭隘利益置于布隆迪老百姓的意愿之上。夺走了布隆迪人民通过选票得到的一切。1993年10月的政变企图不仅造成了恩达达耶总统的死亡，而且还导致许多无辜人民的死亡。没有人确切知道多少人死亡；估计为10万到20万人。但是统计数字并不重要，因为本来一个人都不应丧生；尤为重要是在这些冷酷的统计数字后面都是真实的人——丈夫和妻子，儿子和女儿，所有这些人死去了，身后留下了寡妇、鳏夫和孤

儿。

除了死亡者外,还有70多万人为保住生命逃离他们的国家,逃到坦桑尼亚的就有大约50万人。另有20万人左右在国内流离失所。1993年10月发生的这些事件使我们在布隆迪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希望化为泡影,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新的事态发展,重新点燃我们的希望。

布隆迪温和派为在分享权力概念基础上创立过渡团结政府所作的各项努力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这些布隆迪的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在此过渡期间支持和鼓励西尔米斯特·恩迪班通加尼亚总统的政府。

就卢旺达而言,1993年8月4日签署《阿鲁沙和平协定》是一个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事件。该《协定》为永久解决卢旺达的政治和安全问题提供了全面框架。但是,这项经过非常艰苦谈判达成的《协定》已被那些热衷于保护自己利益而非卢旺达普通公民利益的人当作人质。8个月来,商定的执行《阿鲁沙协定》的时间表一直没有得到遵守。总统是该《协定》中规定的唯一过渡体制。因此,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死亡使我们丧失了卢旺达唯一的合法过渡权威。接着开始了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甚至在我发言时,仍在夺走无辜人民的生命,更不用说它已给邻国带来150万难民了。当时卢旺达政府参加阿鲁沙谈判的大多数人都已被杀害。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广泛基础的民族团结政府。坦桑尼亚是承认这个新政府的第一批国家之一。我们承认并赞赏这个新政府为在卢旺达恢复和平,重建国家体制和实现真正民族和解所作的各项努力和良好意愿。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卢旺达政府为在卢旺达国内创造条件,使卢旺达难民有信心尽快重返家园所作的一些努力。卢旺达必须尽快恢复正常状态。一个其本国人民为保命而逃离的国家不可能是正常的。甚至在我发言时,一些卢旺达难民仍在进入坦桑尼亚。这意味着卢旺达人民特别是胡图人仍感到不安全--无论这是出于有益理由,还是被废黜政权及其代理人发动宣传战争的原因。

在这方面,卢旺达政府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鼓励 and 实际援助,以便恢复基本服务,并重建正义准则、法律和秩序。卢旺达爱国阵线必须保持其部队内部的传统纪律,必须遏制个人报复行径。无辜的胡图难民必须感到安全和有信心,相

信将不因其部落以前犯下的暴行而对他们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必须对所有在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联合国同卢旺达政府合作,迅速使国际法庭开始运作,对所有涉嫌犯下暴行的人进行调查和审判。我们希望,这将减少个人报复行为的动机。

紧迫制止难民潮和随后对其进行遣返至关重要。决不能允许难民营获得永久性,因为这会造成一种促使难民进行政治甚至军事动员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这些难民的东道国有责任解除其武装并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使他们无法被动员起来,不管是出于政治还是军事目的。

邻国和国际社会也应当警告被推翻的政权及其军队不要梦想以军事手段恢复权力。我们不能允许在卢旺达历史上再写下这一悲剧的另一个篇章。因为,正如一位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两个世纪前所说:

“ 仅靠使用武力只不过是暂时的。武力可能克敌一时,但它无法消除再次克敌的必要性,并且一个国家未得到管理而是永久被征服。”

在此方面,我谨强调,卢旺达政府需要在《阿鲁沙和平协定》框架的基础上出发,这在我看来仍然是永久解决该国面临的问题的最好的希望。作为卢旺达和平进程的协助者,我谨赞扬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博士和非统组织秘书处对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不同寻常的承诺,尽管曾经碰到了许多令人失望的情况。我也谨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以及比利时、布隆迪、法国、德国、塞内加尔、乌干达、美利坚合众国和扎伊尔,它们曾担任阿鲁沙和平谈判的观察员。

我也谨感谢曾同我国政府携手一道向我国的卢旺达难民提供救济的联合国各机构、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救济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新的难民仍不断地涌入。收留难民的地方社区需要得到补偿,它们向难民提供了食物和其他服务及用品。巨大和突然的难民流入所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也需要尽早处理。

坦桑尼亚恩加拉区的人民本身被迫在自己国家里象难民一样生活。难民人数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当地人口。当地人面临社会服务中心过度拥挤的情况,他们的所有必需品的价格猛涨,有时在短期内达到300%。在此之上,还必须考虑到安全风险和犯罪的增加。

至于对环境的破坏,仅在1994年4月至6月之间,难民涌

入坦桑尼亚的恩加拉和卡拉格韦造成了18 000吨树木的损失,估计价值为1 200万美元。自从4月份以来,生活在恩加拉的40万难民每天用去200吨木柴,对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关注这一事项,并增加其对我们这些承受巨大难民涌入的东道国的支持。

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承认本组织在卢旺达发挥的作用是远远不够体面的,大大违背了《宪章》的原则。尽管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可在现场创造奇迹,各国政府束手无策等待其他人带头采取行动。卢旺达危机由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优柔寡断而更加恶化。我国代表团只能同意非统组织秘书长的说法,由于我们未能迅速采取行动,我们也应对无辜生命的损失以及整个民族的痛苦而受到责备。

应当向今年6月在开罗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保证派出的非洲部队迅速提供必要的后勤支助,以便能够毫不拖延地全面重新部署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然后,增编后的联卢援助团应当沿着扎伊尔和坦桑尼亚边界建立安全区,其中应当充分储存救济物资,以鼓励难民作为返回自己家园的第一步进入这些安全区。

自从我国成为本组织会员国以来,我们在大会中最关心的问题也许就是非殖民化问题和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因此,我们感到极为满意的是,非殖民化现在几乎已经完成,种族隔离最终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历史的垃圾堆。南非恢复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是该国不分肤色的所有人民的胜利,是联合国的胜利,当然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胜利。

南非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纳入非洲其它部分是多年来非洲最大的成功之一。我们南部非洲次区域很高兴看到,我们人民最终能够在和平中生活,不需担心来自南非的突然袭击或颠覆运动。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区域正在出现的和平与安全现在已经把稀少的资源释放出来用于我们人民的发展。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迅速开始扭转多年来同南非的脱离接触,并一道努力在南部非洲开发共同体内部使我们的经济一体化,新南非将在这一共同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南部非洲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安哥拉的局势继续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忧虑。由于其无休止的顽固立场,安盟继续给联合国调解下在卢萨卡举行的安哥拉和谈制造问题。我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对安盟施加

最后的压力,阻止它继续阻碍这些和平努力。我们决不能忘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赢得了1992年9月联合国赞助的选举。然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尽管赢得胜利,仍慷慨地邀请安盟加入全国团结政府。我们不懂,为什么在安盟不断提出新借口,拖延安哥拉民族和解进程的情况下,某些外国政府还继续纵容安盟。联合国应该告诉萨文比先生,他不能永远我行我素。因此,我们请所有对萨文比先生有影响的国家要求他合作,否则面对第932(1994)号决议中承诺的全面制裁的后果。

在莫桑比克,由于秘书长和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的坚决努力,大多数困难现在已经被克服。我们期待着本月后期将举行的全国选举,希望这些选举不仅是自由和公正的,而且所有党派都能尊重和遵守选举结果。我们希望现在已经牢牢记取安哥拉经验的教训,希望莫桑比克人民免受萨文比先生在安哥拉继续构成的那种威胁。我们特别赞扬希萨诺总统的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来的那种杰出的诚意和宽宏大量。

尽管世界的总体经济增长,尽管建立了无数的开发和社会机构,但在绝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地区,特别是在非洲,贫困仍在增加。

如果我们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有一个提供支持的国际环境。联合国必须能在这一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联合国同布雷顿森林机构不一样,它是一个普遍性机构,联合国的方案在各地运作,而且联合国不忽视国家。但我必须补充,联合国必须象《联合国宪章》授权的那样得到加强,使它能起一个辅助其他参与发展工作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坦桑尼亚,仍然属于债务最重的国家。确实,按国际标准,我们的债务不足轻重。事实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对国际金融体系没有实质性影响。但是,与它们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这种债务负担实在太沉重,成了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鉴于因官方发展援助下降而造成的已经很严峻的财政出入情况,沉重不堪的国际债务负担严重地破坏了大多数我们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

举个例子,如果把我国63亿美元的整个国家债务分摊到我国每一个公民的头上,坦桑尼亚的每一个贫穷的男女和儿童欠我们富裕的债主的钱相当于他们两年的全部收

入。换一种方法说,即使坦桑尼亚政府用它全部的外汇收入来还这笔债,我们仍然要12年多才能还清。有这样沉重的债务负担时时拖着我们,我国的经济难以起飞。

如果我们诚心要在世界上减少贫困,国际社会就迫切需要采取一种统一和协调的方针,争取持久解决象我国这样的国家的外债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全部取消一切双边和官方债务,大量减少债券股和欠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主的债务负担。

在今天的世界上,社会状况最危急,最需要紧迫重视的莫过于最不发达国家。收入下降使贫困加剧,使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受到威胁。

我们希望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论坛,以集中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社会和发展问题,争取使它们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1993年12月,持久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终于结束了。1994年4月15日,我们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开会签署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协定。我们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签署这项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项协定感到满意,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协定照顾到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签字是因为不这样做的办法同样悲惨。事实上,这项新的协定只能意味着加深我们这些国家的贫困,除非紧迫地采取对我们有利的补偿性措施。

人们已在估计,非洲将是实际上损失,而不能从这项新的协定中得到好处的唯一的大陆。预计到下个世纪初,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每年将损失约26亿美元。造成这一损失的原因主要是确定了不利的贸易条件,以及把非洲市场向设在富裕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开放,这些跨国公司现在可以更方便、无阻地进入非洲市场和其他地区的市场。因此,我们将继续要求我们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有更好的贸易条件,并要求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得到优惠待遇。

我们在里约热内卢聚会和结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迄今已有两年。在这次世界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极其缓慢,而且在大多数方面,根本没有执行。世界离可持续发展概念仍相差甚远。《21世纪议程》文件仍是一篇学术杰作,但所涉及的问题仍没有解决。除其他外,联合国应通过持续发展委员会发挥重大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

其当地的科技能力,并帮助它们以有利的条件获得现有技术。

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公约已缔结,这对世界上受这一现象影响的9亿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我们盼望着本月晚些时候签署该《公约》。

我们称赞我们的发展伙伴,它们支持谈判达成这一对非洲来说很重要的《公约》。该《公约》关于非洲的附件载列了我们的决心,要实施《行动纲领》,以遏止因贫困和欠发展而加剧的沙漠化和旱灾现象。除非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作出严肃的承诺,提供执行该《公约》所需的财政资源,否则,沙漠化和旱灾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将无法弥补。

我们欢迎秘书长采取及时行动,编写《发展纲领》。该《发展纲领》为全面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和平、正义和民主等相关问题提供合适的框架。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整个国际社会接受这一事实将导致该《纲领》的实施获得巨大成功。

我们承认各国必须为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负起责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这将更难做到。解决贫困、农村向城市移民、环境退化和复杂的难民局势所造成的问题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我们希望《发展纲领》将提出一项连贯一致的战略,以便就世界发展问题达成一种新的、全面的看法。这样一项战略必须对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具有约束力,成为一项有计划、可实施的人类进步方案。

坦桑尼亚极其重视发展中国家充分有效地参与决策,以解决我们共同拥有的地球面临的经济问题。此外,该《纲领》还应吸收多年来在不同的论坛和会议上通过的各种国际发展协定和战略。我们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如此多的此类承诺和协定,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承诺和协定,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和承诺。在这一冷战后时期,绕开本世界组织或对其发号施令的诱惑可能很大。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出现,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加强联合国及其机构,并巩固其民主传统。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与环境一样贫困是没有国界的。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致力于采取切实措施,消灭全世界的贫困,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我们必须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贫困与不公

正、压迫和歧视一样,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对人类的侮辱。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工作方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提请大会各成员注意文件第A/49/452,内载第五委员会主席给我的信。信中建议修订1992年至1997年的中期计划。

我谨请各会员国对该中期计划第六项方案提出书面意见,至迟不超过10月26日星期三,以便尽快转交给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安道尔公国总理的讲话。

安道尔公国总理奥斯卡·里巴斯·雷格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高兴地欢迎安道尔公国总理安斯卡·里巴斯·雷格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里巴斯·雷格先生(安道尔)(以加泰隆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语本):主席先生,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对贵国科特迪瓦和对整个非洲大陆来说都是重要的时刻,我谨代表安道尔人民和政府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愿。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英萨纳利大使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我今天发言仅几小时之后,安道尔公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将要正式设立。这是安道尔在全世界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这个常驻代表团体现了安道尔人民积极参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愿望。

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我国常驻代表团将为实现各项重要目标而努力。一方面,它将为即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作认真的准备工作。这次首脑会议的目标是,找到减轻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和加强社会一体化的办法。这些目标对于秘书长在他的《发展纲领》中探讨的新的发展机会来说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安道尔将以极大的兴趣参加第三委员会的工作。它的活动支持我们对尊

重人权的历史性奉献。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亚拉·拉索大使所做的值得赞扬的工作。

在担任美国总统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曾站在柏林墙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对在那一历史性场合听他说这句话的世界各地的人来说,“Berliner”一词的含意是“自由的捍卫者”。

对于那些用加泰隆语表达文化的国家来说,也有一个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类似时刻。我指的是杰出的音乐家和举世公认的艺术家庄罗·“巴勃罗”·卡萨尔斯一天曾在联合国大会这里,在秘书长吴丹面前大胆地说:“我是加泰隆人。”每个人马上就知道,他说这句话是在开始唱一首自由的歌,是在声明他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儿子,这个民族充满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并建立了世界上一个最古老的议会民主制度。他在献给和平事业的歌中说到了这一点。让我们记住,联合国赞歌,也就是和平赞歌是他的杰作,由诗人W·H·奥登作词的这首赞歌于1971年10月27日第一次播放。

今天,请允许我谦逊地加入这两个倍受尊崇的重要人物的行列,以同样的精神和激情宣布:“我是安道尔人。”我希望,这句话对你们来说同前面的那两句话具有同样的含意,而不是一种幼稚、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自大的表现。许多世纪以来,我国这个古老的小国一直表现出对自由的热爱、促进平衡与和睦的愿望以及对维护和平的关注。

在获得我国的宪法批准,在我们使我国的国家模式完全符合现代法规定的国家模式的标准以后,安道尔便成为了联合国的会员,这至今已有一年多了。由于这一点,也由于我们是欧洲历史上四个独立的小国中(其他三个国家是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和摩纳哥)最后成为联合国会员的国家,看来现在是探讨超小国家对国际社会可能作出贡献的适当时机。

显然,在一个必须在大范围开展最大行动的世界里,仅仅我们的存在这个事实也许就显得不合时代潮流或无关紧要。的确,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导致保护主义的消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欧洲联盟预示着建立物资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广大地区的时候,

人们很可能会怀疑一些小国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与我们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经常被欧洲联盟之类大的超国家实体包围。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走向一体化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尊重和保护超小国家的特性。显然,这一特性不能以面积大小来衡量,也不允许让少数人屈从于多数人,让较小的集体特性服从于另一个从人口角度来讲更大的集体特性。

由于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和尊重少数人,在国际舞台上大集团政治和大国政治必须符合对这样的群体的承认,即这些群体尽管较小,但是绝对不能让它们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也不能低估它们本身的价值。

显然,所有小国——也许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一从一种或另一种角度来讲都是小国——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样很显然的是,大国对建立和维护世界秩序的贡献是而且必须是决定性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小国除了局限性以外,的确具有人类不可或缺的品性,在目前尤其如此,现在许多和平与和解进程尚未得到解决,依然需要极大的慷慨、理解、容忍和妥协的愿望。

按照他们本身的性质,超小国家必须以其固有的基本方式尊重多样性与相互和睦。正是由于它们国家小,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到,不能把持久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分歧的核心是无法消除的。较强大的国家可以从它们的经验中获取有益的知识。这些经验建立在经过几个世纪才能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目前大国已开始表现出某种自我克制,它们发现使用武力也许能够推迟冲突,但是不能成为持久解决办法的基础。但愿世界各大国受到超小国家所被迫接受的行为准则的支配,并且但愿小国的需求成为大国的美德。提出建议而不是强加于人、谈判而不是胁迫、商计而不是发号施令、和解而不是使问题激化、尊重而不是侮辱、合作而不是利用以及克制而不是滥用:所有这些都是小国所崇尚的行为准则,并且如果我们要实现的是世界人民在尊严中共同生存并且一道与饥饿、贫困、疾病以及人口爆炸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斗争的话,上述这些特性似乎在我们星球的许多地区都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才冒昧地要求大会各会员国对超小国家的长处给予注意,并请各会员国考虑一下它们是否能

够使这些长处成为自己的长处。这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大国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努力将自己摆在那些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人力和经济资源可强加于他人的国家的位置,从而领悟到,许多问题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加以处理,而且有可能更好地保障得到圆满成果。

这种途径起源于对别人的特征、其集体个性以及构成这种个性的所有特性与其文化的严格尊重;因为文化永远是整体性的一个因素。正是这种各种文化的平衡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和平共存的基础,它本身是值得考虑的,对于诚挚和兄弟般的共同生活来讲就更值得考虑了。因此,让我们忘掉同化所造成的困扰和那种认为多数具有优越性的看法;让我们努力以相互尊重来安排我们的共同生活,对于一个处于人口变迁和移民的巨大压力下的世界,这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允许我提及我的国家——安道尔公国,我们是一个仅有61 000名居民人口和三种不同教育制度——安道尔、法国和西班牙教育制度的国家,人口的四分之三由移民组成。我们是一块在欧洲联盟中心象一个小岛屿一样的小领土。我想对安道尔存在的一些平衡进行一番研究可能有助于在南部非洲、中东、或者欧洲的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为实现和平所正在进行的努力奋斗。

同样再思考一下我们时代面临的重大的困扰,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的犯罪已经导致城市安全的急剧恶化。各会员国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即“小就是美”的说法看来可能有些过分,但它毕竟保证了一种比更发达国家的巨大城镇群体所存在的那种安全更好的一种安全水准。

此外,我还愿促请大会对保护环境与捍卫自然的任务的迫切性给予重视。各会员国可能同意我的看法,即一个较小的领土从环境标准方面来讲是易于管理的,因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同样,人力资源的缺乏大概使我们更愿意考虑那些我们将在哥本哈根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给予探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分别为:受排斥的人们的问题、那些在进步的显著潮流当中跟不上具有竞争性的多数的人的问题、残疾人、患有疾病的人以及总的来说所有那些需要得到支援的人的问题。我懂得在这样一个讲坛,基督教个人主义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我相信,如果在小规模上将其移植到其他文化或宗教当中的话,对众人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个人的解答是会容易得多的。此

外,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一思想也正是通常激励产生各种团结一致的运动的的思想,就如同今天在卢旺达一样,那里如果小的社区所共同具有的集体生活的精神得到发扬的话,本来可能会避免冲突。

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和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我真诚地认为虽然超小国家的确很小,但它们并非多余。我们甚至能够作出有益贡献并在许多情景下成为参照点。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必要的国际协议的影响;但自由和团结的精神比主权和边界更加重要。

因此,我请大会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所有国家都努力象超小国家一样行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这些超小国家和那些并非超小的国家一道能够对和平、进步与共存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因为后者已经得出结论,即这就是我们所有国家将能够作出贡献的方式。正如涓涓小溪汇成大河那样,也许在小的特征和对他人及少数人尊重的汇合之上,我们能够共同为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建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安全和更适于生活的世界。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安道尔公国总理刚刚进行的发言。

安道尔公国总理奥斯卡·里巴斯·雷格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坛。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萨达尔·亚塞夫·艾哈迈德·阿里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巴基斯坦热烈祝贺你当选主席和主持这一重要的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你的当选是对你的经历和杰出成就的一个恰当赞美。这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你的伟大国家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主持下,本届大会将成功地促进《宪章》的崇高目标和宗旨。

我还希望向你的前任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谢意。他非常干练地主持了大会以及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工作组的重要工作。

本国际组织的主要宗旨是“以免后世再遭战祸”。联合国必须保证二十世纪的黄昏不会象其黎明那样血腥。我们必须坚决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区域冲突。

阿富汗的内战加重了该国人民在反对外国占领的漫长和胜利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国际社会不应抛弃阿富汗人

民。我们必须继续要求立即结束敌对行动。我们必须为了将来治理阿富汗促成一种新的政治共识。要促成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该国的和平地区开始重建。

我们欢迎塔吉克斯坦达成的暂时停火。巴基斯坦希望商定的初步步骤将得到各方执行。这对于确保本月底将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由联合国主持的第三轮谈判的成功是必要的。

联合国必须在两族和两区结成联邦的基础上促进和平解放塞浦路斯问题,在这一联邦中,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塞浦路斯希腊族将享有同等的地位。

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执行其决议,制止亚美尼亚的侵略并恢复阿塞拜疆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们都要对没能制止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承担集体责任。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一场大屠杀。20万波斯尼亚人,大多数是穆斯林,遭到了屠杀。其中有3万名无辜的儿童。4万名穆斯林妇女遭到了塞尔维亚人计划的强奸。几百万穆斯林男女和儿童被强制和残暴地赶出了家园。

在侵略发生的同时,主要大国研究了促进和平的动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50项决议,但却没有执行这些决议。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所指定的调解员提出了奖赏侵略者和惩罚受害者的和平计划。甚至连波斯尼亚人的自卫权也遭到了剥夺。联合国保护部队监督了救济工作,但未能阻止战争或保护波斯尼亚人民。只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拖延很久以后发出空袭威胁,才使塞尔维亚人停止了对戈拉日德和萨拉热窝的继续屠杀。

波斯尼亚塞族拒绝了事实上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并不公正的和平计划。和平计划没有完全制止“种族清洗”,没有惩罚侵略者。它没有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应该向波斯尼亚提供具有公正的和平,否则和平不会持久。

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感到吃惊的是安全理事会最近决定放松对贝尔格莱德的制裁,尽管贝尔格莱德是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根本原因。这不会制止向波斯尼亚塞族大量提供军事物资。它只会助长塞尔维亚人的不妥协。

必须允许波斯尼亚穆斯林行使其自卫权。巴基斯坦和

其他伊斯兰国家充分支持立刻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要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某些国家扬言如果取消禁运将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中撤走其部队。伊斯兰国家准备向联保部队派遣士兵以弥补这种撤走所导致的任何人员短缺。我们要求联保部队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有效保护塞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并向它们提供粮食等必需品。我们也敦促在所有安全区周围建立禁区。

如果扩张主义在波斯尼亚没有得到制止,如果种族灭绝没有受到惩罚,战争的病毒将会传播到科索沃、桑贾克以及也许整个巴尔干半岛。在这一动荡地区一场更广泛的冲突可能对欧洲和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最严重的后果。

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也在发生一场严峻和流血的斗争。正象在波斯尼亚一样,这是一场发生在毫无防御的克什米尔人民同现在在60万人员的印度占领部队之间的不平等斗争。在克什米尔,正象在波斯尼亚一样,《宪章》、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原则遭到了违犯而不受惩罚。

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是公正、合法的。他们曾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承诺,即他们将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决定他们希望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1952年6月26日,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先生在印度议会说道:

“如果经过适当的公民投票,克什米尔人民说‘我们不想和印度在一起’,我们保证接受……我们不会派出军队反对他们”。

但印度却出尔反尔。它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派出部队反对克什米尔人民。它有意用暴力镇压了克什米尔自由运动。在过去五年中,4万名克什米尔人遭到了屠杀,另有几千人被关在印度监狱内。作为其摧毁克什米尔人民精神的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士兵强奸了几千名克什米尔妇女。整座村庄和街道被放火焚烧。酷刑成了例行公事,经常有人失踪,而且草率处决成了在克什米尔的通常作法。

一些公正的组织和观察家,例如大赦国际、亚洲观察、国际人权联合会、法学家国际委员会、促进人权医生学会和其他许多组织提供的文件充分证明了印度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径。世界了解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野蛮行径。令人遗憾的是,世界迄今还是保持沉默。

去年,当面临着受到这个大会指责的可能性的时候,印度提出恢复与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会谈。在丁今

年1月举行的会谈中,印度没有显示出任何达成解决的愿望。该国重复了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印度外事秘书对我们说,印度有权使用多少武力就使用多少,以阻止克什米尔脱离印度。当在人权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印度提出了表面的让步,以防止向克什米尔派遣一个联合国调查团。此后,该国否认它曾达成这样一项协议。

同样,在克什米尔本地,印度在国际压力有所缓和的时候立即使其镇压行动升级。在我们同意恢复会谈的第二天,印度就在索波进行了一次屠杀,杀害了50名克什米尔人。印度一得出结论认为各大国将由于从印度得到的贸易和利润而无视其侵犯人权的行径,便使其对克什米尔人的镇压和反对巴基斯坦的言论急剧升级。

让我援引亚洲人权观察组织最近题为《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继续镇压》的报告(1994年8月,第六卷,第八期)中的结论:

“正如本报告大量显示的那样,当国际上几乎停止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克什米尔境内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实际上,可以这样说,过去6个月内拘留中的死亡事件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增加与从前印度的批评者们,尤其是美国,发出的信息并非没有关系,这个信息是,人权在双边讨论中不再占有显著地位”。(英文第20页)。

我记,看到印度商务部长今天在这里作的发言。我尽管充分同意他所提出的崇高理想,却与著名的哲学家,已故的贝特兰·罗素先生有同感,他说:

“当人们看到印度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崇高理想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彻底粉碎的时候,他们很难避免一种绝望的感觉”。

印度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夸耀自己和其态势。恐怖主义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对无辜的人采取暴力。必须谴责这种行为。用这个尺度衡量,印度每天都在对克什米尔人有系统地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另一方面,抵制外国入侵者,反抗一支进行谋杀、使用酷刑、强奸和纵火的占领军的行为不是恐怖主义。它是进行自卫。自卫是一项自古以来就有的权利;是一项得到《联合国宪章》承认的权利。尊贵的代表们,如果你的儿子被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你的门前,你将如何反应?如果你的女儿被占领军的士兵们轮奸,你将如何

反应?根据国际法,根据我们的《宪章》,根据我们的决议,克什米尔人民都有权用其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抗印度占领军。不能把他们的英勇斗争说成是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勇敢的自由运动,值得国际社会予以充分支持。

巴基斯坦是克什米尔争端中的一方。印度对我们的克什米尔兄弟、姐妹们的野蛮屠杀使我国人民怒火中烧。然而,我们一直实行克制。我们向克什米尔人提供了道义、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

副主席布兰迪诺·坎托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会议。

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军事帮助。印度关于巴基斯坦支持所谓好战分子的指控是为了提供借口来解释克什米尔自由运动的恢复力,减少国际上对克什米尔人的同情和支持,并且用心更为险恶的是,可能是为了制造一种宣战借口,以便对巴基斯坦发动新的侵略。

克什米尔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拉奥总理在今年的印度独立日要求吞并全部克什米尔。近几个月来,印度的政治家们和将军们威胁着要发动越过控制线的袭击。印度违反停火的行为已经升级。仅仅在8月,联合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印巴观察小组)就记录了巴基斯坦对印度违反停火行为的142次控告。印度越过控制线的射击是专门以平民为目标的。在过去5年中,控制线我方一侧有600多个平民被杀害。巴基斯坦的自我克制不应被误解。印度的侵略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处理克什米尔问题时有3个优先事项:第一,避免爆发冲突的危险;第二,减轻克什米尔人民的苦难;第三,展开一个可信的外交进程,以便公正与和平地解决克什米尔争端。

为了制止对和平的威胁,我已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提议大大增加当前由35名观察员组成的联合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的人员。应该使印巴观察小组能够执行其在控制线两侧进行巡逻的任务。这将有助于防止违反停火的行为、缓和紧张状态,并避免爆发冲突的危险。扩大了联合国观察小组还可以核实印度关于巴基斯坦正向克什米尔人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的指控的真实性。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核准我们的提议。我希望印度将允许联合国观察员执行其在控制线两侧巡逻的任务。

第二,为了减轻克什米尔人民的苦难,印度应该采取某些真诚的步骤来停止其镇压。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印度由于

担心本大会的意见,终于被说服释放了至少两名被监禁的克什米尔领袖。这是克什米尔自由斗争的一个胜利。我们希望将允许这些年老体弱的领袖到国外接受医疗。和纳尔逊·曼德拉一样,由于其对自由的承诺而被监禁了20年的沙比尔·艾哈迈德·沙仍然没有得到释放。国际社会必须要求释放这个政治囚犯。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印度已放弃它在克什米尔的镇压战略。要使这变得显而易见,印度只须取消在克什米尔实行的严厉的紧急法,释放在印度监狱中囚禁的所有克什米尔人,部分撤出其驻扎在克什米尔的庞大军队,并允许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自由进入被占领的克什米尔山谷。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不会忘记印度暴行的受害者们。正如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一样,必须由一个国际法庭来调查各个公正的机构所记录和报告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必须把那些被发现有罪的人绳之以法。

最后,为促进政治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而进行的努力必须考虑到三个现实。

第一,克什米尔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能够以武力镇压。新德里关于即将取得成功的预言旨在欺骗印度公众和世界舆论。印度军队已陷入了困境。

第二,尽管印度断言巴基斯坦进行了干预,克什米尔的斗争显然是本地人的事。在克什米尔境内的控制线上每一公里有400名士兵。印度人在沿线设置了铁丝网并埋下了地雷。任何东西都无法通过。监测该线的联合国可以证实这一点。任何外来势力都无法劝说克什米尔人作出克什米尔男女和儿童在自由事业中正在作出的那种牺牲。五年来,克什米尔人坚持斗争。即使巴基斯坦希望他们不那么做,他们也会继续斗争。

第三,任何可信的克什米尔团体或领导人都不会接受在印度联邦内对克什米尔的“解决办法”。印度鼓吹的所谓政治进程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有34个克什米尔政党和组织参加的各方自由会议已拒绝了除脱离印度以外的任何解决办法。

阿布拉勒·甘尼·罗内获释后在两天之前到达斯利那加时曾经说:

“在克什米尔举行的任何选举都将是联合国的主持之下进行并且……只能是为了自决权而进行”。

另一位获释的克什米尔领导人西耶德·阿里·沙阿·甘尼

曾说：

“选举无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该邦的人民不会接受除自由之外的任何办法。在争取自决的斗争中将不会有任何妥协”。

印度企图在克什米尔进行另一次骗人的选举，但这是不会成功的。正如安全理事会在1957年所宣布，这种单方面的行动不能够被认为是最终处理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克什米尔争端的最终解决必须以克什米尔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为基础。巴基斯坦在今年2月向印度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概要的说明了了解他们意愿的种种可能的方式。

巴基斯坦欢迎秘书长表示将不遗余力地“协助寻求持久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A/49/1, 第542段)。我们希望印度将和巴基斯坦一样也接受秘书长斡旋的建议。巴基斯坦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进行会谈。外交秘书级别的谈判正是出于巴基斯坦的主动。但在六轮谈判之后，我们显然感到在印度继续在克什米尔进行杀戮的时候，他表面上与巴基斯坦进行谈判的愿望是极不可信的。巴基斯坦并不拒绝对话，但这不应是聋子对话。

克什米尔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两国之间的每一个争端都是双方的。它也是一种国际问题。联合国应该注意到这种争端，特别是当他们涉及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历次决议时更是如此。

克什米尔是解决南亚各种问题的关键。克什米尔不能再受搁置。沉默的阴谋必须打破。克什米尔局势必须解决以避免冲突的危险。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也将增强南亚的常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前景。

我国政府认为，为了减少南亚战争的危险，极为重要的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常规武器方面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促成一种平衡。印度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军力。它的军力几乎都是针对着巴基斯坦部署的。在过去10年期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即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购置的武器是巴基斯坦购置的武器的5倍多。巴基斯坦的自卫能力自从1990年以来进一步降低了。去年，巴基斯坦的国防开支实值有所下降，但印度的却增加了20%。

巴基斯坦已经向印度提出了几项建议来进行常规军备控制：就一项双方同意的军力比例进行谈判；采取措施预防

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采用商定的南亚常规军备控制的原则。

巴基斯坦无意将其微薄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方面。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也会有助于制止本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危险。

巴勒斯坦在不扩散条约之前就对南亚的核扩散表示关切。早在196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就警告全世界说印度将滥用核合作。1972年，已故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建议设立一个南亚无核区。印度于1974年5月爆炸了它的核弹——讽刺性地称之为“笑面佛”。巴基斯坦作出了种种努力来对抗在南亚的扩散。除了无核武器区之外，我们还在其后提出了各项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签署不扩散条约，结束所有的安全保障制度，共同放弃核武器，签署双边禁试条约。所有这些都遭到了印度的轻蔑的拒绝。美国提出的举行一次有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的促进南亚不扩散会议的建议也遭到了新德里的拒绝。

巴基斯坦在核领域方面表现了负责和克制。虽然我们获得了某种技术能力，但我们并没有制造或爆炸任何核装置。我们并没有部署核武器。我们并没有转让敏感技术。

印度在爆炸其核弹20年之后，正准备朝扩散方面采取另一个会带来灾难的步骤：生产和部署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印度正在继续进行其中程AGNI导弹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工作。它在今年进行了短程普里斯维导弹的试射活动。普里斯维是一种机动导弹。一旦生产，巴基斯坦就将认为它已经被部署。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防止核武器在东南亚扩散现在还为时不晚。巴基斯坦建议采取避免这种危险的两项关键性措施。

首先，我们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不生产或部署弹道导弹的协议。印度生产和部署普里斯维导弹将引起巴基斯坦相应的反应。我们已提出建立南亚无导弹区的想法。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个目标。

其次，我们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有关不生产或部署核武器的协议。我们希望印度能对这个已提出很长时间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我们希望作为第一步，印度能同意与巴基斯坦发表一个放弃核武器的联合声明。

不幸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从未通过双边谈判成功地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争端。在两个重大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印度河水条约》和《库奇兰恩和约》——是由第三方调解达成的。

在南亚局势高度紧张和和平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联合国会员国有使用它们的集体影响以促进解决克什米尔、常规武装冲突和不扩散等互相关联问题的根本性责任。

巴勒斯坦希望与印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国人民把他们的精力全部用在国家建设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上。我们要把猖獗的贫困幽灵从我们中间赶走。我们希望我国人民有尊严地生活。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我们解决克什米尔和其他问题并且在南亚建立信任和信心的气氛。

巴基斯坦已经走上新的社会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道路。我们释放了私营部门的活力。我们创造了十分有利于国内和国外投资的经济环境,其结果令人十分欣慰。十年之前与美国能源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达成了价值40亿美元的国外投资的协定。巴勒斯坦经济的能源、电信、电子和其他富有活力的部门可能得到更多的投资。

今天巴基斯坦和所有南亚国家有机会打破贫困和欠发达的循环。我们必须不放弃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在让历史从我们身边悄然而过。

我们在联合国的五十周年前夕聚会。冷战的结束释放出长期受到压制的积极和消极的力量。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的原则胜利了。我们庆祝许多自豪和自由的新国家加入联合国。民主在南非获得胜利。和平的胜利很可能将在中东实现。今天全球核战争的威胁已不存在。世界某些地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重大的技术突破发生了。我们现在有潜力实现全球和平、处理全球性问题和促进全球的繁荣。

即使当我们庆祝这些胜利,理智和政治家风度的胜利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抬头的侵略、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偏见的黑暗势力。

一旦冷战结构的限制解除、国家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冲突和争端便象流行病一样地爆发,这可能并不奇怪。国际社会没有准备面对和击退侵略——波斯尼亚、阿塞拜疆和克什米尔便是证明。我们未能具备制止种族灭绝的政治意愿——卢旺达便是证明。我们没有准备为帮助饥饿的人和拯救地

球上被剥夺权利的人付出代价——萨赫勒便是证明。

本届会议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恢复我们人民的以下希望和信心,即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努力能够重建已经被破坏的和平;我们可以给受苦的人民带来安慰;我们可以在需要的地方主持和实施公正;我们可以扩大繁荣的地平线以接纳困于贫穷之中的千百万人。

约旦哈希姆国王储埃尔·哈桑·本·塔拉尔亲王殿下上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约旦哈希姆王国王储的发言。

约旦哈希姆王国王储埃尔·哈桑·本·塔拉尔亲王殿下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约旦王储埃尔·哈桑·本·塔拉尔亲王殿下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埃尔·哈桑·本·塔拉尔亲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高兴地祝贺你的当选并且祝你和主席团成员成功地完成你们的职务。你的当选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你和贵国的信任和崇敬。你的智慧和忍耐将是本届大会圆满成功的关键。

我谨向你的前任表示深切的赞赏,赞赏他在去年就任期间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的工作。我还希望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感谢,他不知疲倦地努力以加强本组织应付迅速变化世界的挑战的能力。

人们十分欣慰地看到联合国的会员中现在又多了几个最近独立的国家。我们和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有着宗教和文化亲缘的紧密联系;我们和所有国家有着友好和互相尊重的关系。我们希望始终是联合国基石的普遍性原则不久能包容剩下来的人民和地区,以使本组织能真正地代表人类的集体良知。

我认为向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副总统以及南非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是恰当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建立了基于正义和平等的新秩序。世界为南非回到国际社会的怀抱而感到高兴。南非人民已经证明,只要所有人得到参与缔造和平的机会,和平总是会实现的。这是值得思考的主题。

在我们接近联合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其成立五十周年——时应当展望未来而不是向后看;估计即将发生而不是

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应适当地考虑我们的全球秩序的具体形式。

南非为改变中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范例和事业。它向我们表明,一个新秩序必须容纳所有人。我们必须能听取各方面的声音:不论来自弱国或强国。新秩序必须是非排他性的并且积极地鼓励所有层次上的参与;因为在我们日渐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一国的前途即是所有国家的前途。我认为这是全球和平的核心。

于是,有人要求我们阐明新的办法。我们必须保护法治,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确保民主、多元主义和尊重人权适用于各国的生活。我们必须制定新的合作、通讯和妥协程序。我们必须促进社会责任、国家承诺和国际义务。各国都必须学会与其邻国共处;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学会愿意作为和平事业的伙伴一起工作。

这种变化正在中东出现。几十年来,我的区域一直是冲突和战争。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一个和平、希望和人人参加的新联邦的历史性机会。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约旦的主要关切。家庭纽带、地理位置毗邻以及共同的历史和传统都确保约旦非常关切这个问题。多年来,约旦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我们自1948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事业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已受到广泛承认。我国已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和返回者,这给我国经济造成庞大的代价,给我国的有限资源造成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但是,我们仍然致力于我国民主化进程,致力于保护公民自由和人权,而且还致力于给我国所有公民提供象样的生活条件和服务。我们作出这项承诺的基本信念是,人民在广泛基础上参与文明社会对其健康至关重要。因此,约旦能够经受战争的蹂躏,在我们区域长年动乱后生存下来。

如果说约旦处于战争前线的话,那么他也处于和平的前线。我国曾帮助起草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用该决议中众所周知的话说,约旦一直为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进行坚定的努力。我们以1991年马德里会议促进了目前进程的开始。在当时的以色列政府拒绝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进行谈判时,约旦挺身而出,通过提供保护伞让巴勒斯坦人参加,帮助他们起到其适当作用。

现在,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正

在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他们已经在加沙和杰里科就职,酌情处理其事务;他们的命运终于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约旦欢迎这些事态发展,并将继续尽力确保巴勒斯坦自治安排取得成功。

在约旦—以色列轨道上,我们共同议程为我们商定在水源、环境、能源、领土、边界和区域安全等领域使用的方法铺平了道路。这些协议已导致1994年7月25日侯赛因国王陛下和以色列总理拉宾进行会晤,签署了《华盛顿宣言》。这份历史性文件结束了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我本人刚同克林顿总统和外交部部长佩雷斯进行建设性会晤,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三边发展构架和该区域的经济平衡,并保持和平势头。

约旦和以色列正在进行实质性会议,谋求以公正和双方均可同意的解决方法解决我们共同议程上列出的各种悬而未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经得住变革之风考验的稳固基础上缔结一项和平条约。我们认为,这项条约将在和平条件下划定我们的权力和义务。它还将给区域一级的合作敞开大门,从而使我国各国人民都可享受和平利益。约旦一贯认为,中东作为文明的摇篮和三个伟大的一神教的诞生地,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宽容和相互依赖的区域。

虽然我们同以色列的双边会谈非常重要,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任何两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存在。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全面和平。我们目前处理的许多问题都不可能仅局限于双边主义,而都要求有区域和国家参与。

其中的一个问题涉及耶路撒冷城的宗教意义。对三个伟大的一神教信徒来说,耶路撒冷必须成为和平及其辉煌表现的最高象征。但是,必须通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最终解决该城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作出的任何安排都必须符合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几百万信奉者的需要。

同样,和平的经济层面也是一个不以国家划界的关切。中东各国的经济都受到冲突的破坏。如果要使和平根深蒂固,就必须重振中东的经济。获得更公正的经济增长机会将是关键。应该对国际减免债务的战略进行规划,使其包括巴黎和伦敦俱乐部更好的减让条件。

但是,该区域各国也必须起到其作用。应该放松对贸易的限制。我们必须给持久发展和经济福利制定一个非歧视性办法。我们希望,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中东—北非首

脑会议将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工作小组所取得的成就,并证明是探索各国政府、私有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潜在伙伴关系的有益论坛——因为这种伙伴关系肯定是该区域前途的关键。

冷战的结束所造成的国际变化同其他地方一样,也影响了中东的政治局势。世界强权政治的变化改变了区域各国成本效益的计算方法,使人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国家再也不能在所谓的“零点游戏”中牺牲他国利益谋求其战略目标。在区域安全制度方面,区域中的每个国家武装力量的规模、作用和职能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将有益于维持和平职能,使稀少的资源得以释放出来,满足发展需要。

在这方面,约旦完全支持秘书长所概述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五个层面。我要补充一点,即约旦支持目前精减联合国的努力,并完全赞同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尝试。我们还支持美国的提议,即以更多的人员、更有效的实地能力、联合国和各参加国之间更大的合作以及更加统一的培训办法,加强维持和平行动。

在这里,约旦再一次处于变革的前线。我国武装力量作为联合国指挥下的维持和平人员已部署在格鲁吉亚、安哥拉和前南斯拉夫等遥远地方,他们十分珍惜参加这些使命的机会,因为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他们使我们得以参与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约旦对参与制定全球安全安排感到骄傲。

随着和平进程的发展,将有必要促进共同区域特征和共同区域前景。整个中东都必须为表达这种前景作出贡献。关键还是参与。如果区域各国和各国人民在塑造其未来方面都有发言权,这个未来的成功就将对他们有利害关系。因此,成功将更有可能实现,因为我们区域的多样性是一个积极的资产,我们必须学会创造性的利用这一资产。我们不可避免地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正如我们在另一些问题上意见一致那样。但是,我们必须能够讨论我们的观点,直到其他人会听取我们的观点,因为诚实的交流是真正参与任何联合努力的基础。

本着这一精神,约旦感到义不容辞,应当对全球和解进程所受的威胁表示关切。绝不能允许惰性阻挡全球事务的进行。根深蒂固的冲突不会自行消失。我们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迅速行动帮助解决这些冲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的形势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惊人作法甚至就在现在还在继续。我国憎恶这些暴行。约旦支持国际社会为结束这场悲惨和劳民伤财的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已采取积极步骤减缓这场冲突造成的痛苦。约旦参加了不结盟运动波斯尼亚突击队。我们的士兵组成了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维持和平努力中第二大的分遣队正参加人道主义救济和维持和平任务。约旦支持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建立联邦的维也纳和华盛顿协定,欢迎接触小组提出的得到经济七大国那不勒斯首脑会议支持的和平计划。塞族对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人所接受的计划的挑战令人感到极为失望。

我现在谈谈海湾局势。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国际准则必须得到遵守;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护。必须在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捍卫他们的主权和政治独立。我国也谨重申其对伊拉克人民困境的严重关切,他们的生活条件正在迅速恶化。我们打算竭尽全力减轻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只要这样做符合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规定。

对伊斯兰形象的歪曲仍然令人极感关切。本机构应当关注对伊斯兰的恐惧或对穆斯林的仇恨的扩散。这种现象以各种方式出现,从纯口头的作法到粗暴的人身攻击。其提倡者使用煽动性的词藻。他们宣扬文化大灾难的不可避免性,用疯狂的极端主义来污蔑所有穆斯林人。他们无视伊斯兰是一个广泛和能适应新环境的概念和体制。本地球上现在生活着十亿穆斯林人。因此,伊斯兰涵盖各种政治见解,不同的神学思想,和无穷无尽的人类经验。

约旦敦促会员国携起手来,更好地理解伊斯兰这一宗教、文化和文明。必须以教育运动、文化交流和类似的努力来监测并抗击反穆斯林的情绪和其他仇恨伊斯兰的表现。我们始终赞成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这是同偏见和成见作斗争的最可靠的办法。

我在本大会代表我国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已有十年以上。这导致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的设立。该委员会获得授权调查大量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该委员会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提出了一系列报告,表明了即将到来的全球人道主义灾难的规模。

如果今天能够在本大会告诉各位该委员会的工作发挥

了重大作用是令人宽慰的。这样做是令人宽慰的,但这却不是事实。一个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尚未建立。无权的人仍然无权。被剥夺的人仍未收复生而就有的权利。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难民、更多的街头儿童、更多的冲突的无辜的受害者。更遭的是这些问题仍然只得到零星的处理。人们经常说,我们不当设法治疗大量症状,而应设法找出根源。令人惊讶的是,有时看来我们不仅仍然没有寻找根源,我们正在尽力忽视症状。

今天,我试图谈谈根源。我已经说到在各级水平上进行参与的极端必要性。我已经在大会提出了一种全球秩序的远见,其特点是伙伴关系和交流、容忍和信任。在一些地方,这种远见正在实现;在另一些地方,它从未如此遥远。舍此以外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我保证,我国充分支持本组织,因为在我们接近第二十一世纪时,在本组织接近第五十周年时,《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从未象现在这样重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约旦哈希姆国王王储刚才的讲话。

约旦哈希姆国王王储埃爾·哈桑本·塔拉尔亲王殿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阁下发言。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地并且也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祝贺主席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主席。我们满意地看到,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被交托给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代表了一个兄弟的非洲国家,他的国家同印度尼西亚有着传统和密切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我也谨向你杰出的前任、圭亚那的英萨那利大使阁下表示深切的赞赏,他如此干练地指导了最为多事的一年的工作。

我同其他成员一道向秘书长表示敬意,感谢他为解决全球各种冲突局势所作的坚定的努力,以及他为使联合国成为当前严峻的时代中全球管理的更有效和效率更高的工具所作的努力。

我们开会正是处于变化过渡的时候,正值全球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早先的概念和做法不再那么适用,现有的机构不再那么有效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矛盾的时候,忧虑加深中

却孕育着不灭的希望。在一个既在愈合也同时在分裂的世界中,空前的挑战笼罩着光明的新机会。

冷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到处洋溢着喜悦情绪已经淡去,并正在被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无把握、不安和失望感所取代。经过海湾战争令人清醒的经历,看到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和卢旺达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和暴力行径,人们对如何最有效地应付一个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的种种要求和变幻,对如何响应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已不再那么有把握了。因此,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集体形成一套更有效的全球管理体制,来应付将在今后几十年中改变国际关系的形态和内容的巨大变化。

如要成功地实现这项基本目标,我必须以承认联合国是它的中心机构和主要机制为基础。联合国是我们今天拥有的唯一的普遍性机构。任何全球管理体制如果要行得通,并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接受,就必须牢牢地扎根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且按照主权平等、共同利益和好处、公平分担责任和对全球合作的共同承诺的思想来组织。

因此,确保并维持联合国组织的效力和生命力极端重要。自从联合国将近五十年前成立以来,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国际问题已比过去复杂得多。联合国今天所承担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它也正背负着一场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们希望联合国处理众多的问题,同时联合国却为资金严重短缺所困,这种矛盾的局势继续下去,必然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后果。

同样重要的是确保联合国系统继续忠实于联合国创立时的各项民主原则,并适应时代的现实。因此我们认为,改造联合国系统的进程应该超出仅仅改进联合国程序和做法的程度,应该除其他外,考虑到这样一些重要方面,如成员国在该系统各层次的代表性,以及他们有效地参加决策过程。在大会工作继续合理化的同时,大会应该在塑造这一进程方面起一个中心作用。

关于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名额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过去已在各种场合清楚地阐明了它的立场。对安理会组成情况的最后一次审查是在近三十年前进行的。从那时以来,联合国会员的数额增加了许多,因此扩大安理会成为一项紧迫事项。这一扩大应该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并

且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组织内占压倒多数。此外,我国代表团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名额的提案。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虽然地域分配的原则是重要的,但它不应该成为决定新常任理事国的资格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其他的客观标准同样重要:即政治、经济和人口现实;一个国家在区域内和全球为促进和平、安全与经济发展作贡献的能力和纪录;以及各国对承担这样一种地位所固有的各种责任的承诺。在这些努力中,我们目标必须继续是促进透明度、合法性、责任心和效率。

有人曾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及发展合作方面,联合国系统的运作没有充分的协调与连贯性。但在解决这项目题时,我们认为,现在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理事会的提案并没有特别可取之处。相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让它能够充分发挥《联合国宪章》中所设想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想要请负责财政和发展规划的各国部长或其他有关的部长,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会议上参加讨论重要的发展问题是有益的。联合国还应该继续加强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协调,以提高政策的连贯性,加强发展合作。

虽然冷战的告终已经减轻了核战争的威胁,但是它并没有消除核武器所构成的威胁。核裁军仍然是一项必要任务。希望随着在限制和减少军备的关键领域取得进一步成功后,核武器的数量增长不久能够得到制止。最近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包括因为《关于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第二项裁武条约)的胜利缔结,以及大多数核武器国家继续遵守暂停核试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武库已有重要削减。

在这方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作为实现核裁军的一项重要步骤,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紧迫措施,其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因此,已经清楚地明文授权裁军谈判会议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幸的是,某些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愿,为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的进展造成了障碍。必须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做出认真和协同努力,同部分禁试条约修订会议上更广泛的多边努力一起,确保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内,达成一项普遍性和可以有效核实的条约。我们认为,这样一项条约将成为一种核不扩散体制的一个真正可信的手段。

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长会议的召开,将为清

醒地评估该条约的执行情况提供一次独特的机会。毫无疑问,延长《不扩散条约》的问题同这样一些关键问题相连:如核裁军、为和平目的传播核知识,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以及建立无核武器区。因此,不应该把我们将明年所面临的问题过份简化为一种有限期还是无限期延长之间的选择,或是有条件或无条件延长《不扩散条约》的问题。该条约的寿命最终将取决于这些多方面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核武器国家履行其义务的诚意。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对裁军与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亚太地区,今年7月在曼谷创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反映了该区域各国希望为其人民确保一个和平稳固的政治与安全环境。这一论坛具有独特性,因为它不是为应付危机而设立的,而是为驾驭战略变化而进行的一项预防性外交行动,以便在下个十年内使大国间和区域大国间的稳固关系能逐渐和平地发展。同时,东盟正加紧努力,以便实现其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为组成部分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蓝图。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在该区域实现稳固和平的重大一步是对全球裁军和不扩散的重大区域性贡献。

虽然目前亚太地区相对和平,但绝非没有紧张局势和对潜在冲突的担忧。在该区域必须面临的实际和潜在问题包括国家间争端持续不断,尤其是领土争端和主权主张重叠。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潜在的冲突,争端可能加剧。因此,东盟在其1992年的《马尼拉宣言》中强调,其《友好合作条约》可以作为在该区域制定国际行为守则的基础,并因此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在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会议上各大国和区域内国家对将该《条约》作为这样一项行为守则作出了积极反应。因此,更有必要促进在南中国海主权主张重叠的国家间的合作努力,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今年8月美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的协定是朝着解决这一问题迈出的重大步骤。我们仍然认为,要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只能通过相互克制和进行真诚、持续的对话和谈判。

在中东,和平努力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渴望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一年前签署历史性《原则宣言》之后,又于今年3月在开罗签署了《协定》,规定了加沙地带和杰里科走向巴勒斯坦人自治过渡

的方式,从而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顺利返回这些地区铺平了道路。但是,另一项突破是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华盛顿宣言》,结束了它们间的战争状态,为缔结一项全面和平条约开辟了道路。

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些积极事态发展,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仍摆在面前的艰巨挑战。现在应将巴勒斯坦自治扩展到国民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现在应该把巴勒斯坦自治扩展到整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此外,国际社会应加速提供所承诺的援助,帮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此外,阿以谈判的其他轨道取得进展显然是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第338(1973)和第425(1978)号决议基础上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平的最终保障是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包括戈兰高地和南黎巴嫩。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塞族施行的暴行、对平民的无谓杀戮和“种族清洗”仍在继续。波斯尼亚政府要求有效国际干预或至少解除考虑不周的武器禁运,但它们的请求未被理睬。这一冲突的野蛮性是历史上少见的,国际社会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冲突的继续和无时不在的冲突蔓延的危险。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接触小组最近提出的和平计划,使结束冲突的国际努力遭受严重挫折。

副主席皮尔斯·巴隆先生(乌拉圭)主持会议。

屠杀不能就这样继续下去。安全理事会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态,关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已不再适用。此外,面对波斯尼亚塞族继续顽固不化,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坚决措施,以确保实现和平计划。同时,国际社会应考虑设立一项谈判机制,包括召开一次适当组织的国际会议,处理前南斯拉夫境内和周围冲突的更广泛的方面,最终导致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使地区的人民在没有侵略、占领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安全地享受和平生活。

今年初,南非人民终于结束种族隔离,举行了首次非种族选举,并随后建立了纳尔逊·曼德拉总统领导的第一届民选政府。我们大家都欣喜地欢迎这一历史性事件以及南非重新在国际社会占据应有的地位。印度尼西亚盼望着与南非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密切的互利合作。

但是,在非洲其他地区,我们深感痛苦地注意到,在卢旺达暴力肆虐,导致大批难民逃往邻国,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

主义危机。随着战争和流血的结束和在基加利建立新政府,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重新参与以《阿鲁沙协定》为基础的民族和解进程。该《协定》确实为这一目的提供了合适的框架。

不断爆发暴力事件、安全状况恶化仍然是索马里局势的特点。我们仍深信,只有通过联合国和非统组织(非统组织)主持下所有各方进行持续对话,才能解决该国内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根据今年3月索马里领导人发表的《宣言》,尽早召开民族和解会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于下月生效。这是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为海洋创立新秩序的努力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于1985年批准的这一《公约》将作出重大贡献,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并确保海洋的公平利用。

我确实同意秘书长在题为“发展纲领”的报告(A/48/935)中的观点,即经济是进步和整个发展的引擎。如果把这一比喻再引伸一步,也许可以说,目前的世界经济是一台已熄灭的有缺陷的引擎,但现在又开始预热。它的缺陷是不平衡和不公正,使其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即发达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扭曲。它曾因陷入一场漫长而具有破坏性的衰退,但最近已显露出一些复苏的苗头。

然而,世界经济增长的总数据掩盖的情况与它们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多。正如《1994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恰当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仍然是一幅充满鲜明对照的复杂画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太弱,太易受冲击,难以在世界市场上成功地进行竞争,从而面临着进一步遭到排斥并陷入赤贫的危险。因此,除了需要维持非通货膨胀的全球经济增长外,我们必须采取的紧迫行动依然是消除贫困,加快发展中国家持久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如果说全球进步与发展的引擎是使人类在下个世纪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么必须使它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平衡和协调,并提高其运作的效力和效率。我们别无他择,只有建立一种促进发展的新的伙伴关系,它包括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使各国充分认识到题为“恢复通过伙伴关系加强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对话”的大会第48/165号决议。国际社会通过了这项决议,从而以新全球伙伴关系精神确认了真正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和公平分担责任这些原

则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这种南北伙伴关系的必要结果,南南合作更加势在必行,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对世界增长与发展分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们期待着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期待着进行的审议能导致通过“发展纲领”。

正如许多人在今年6月举行的世界发展问题听证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会议上主张的那样,这项纲领应该侧重于行动,并应为平衡和全面地处理发展问题提出一个政策和优先事项的总构架。他应该反映全世界接受并承认联合国为能够处理发展问题以及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唯一组织。还有必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组织联合国的各个机构、机关和方案,以使它们能够有力、有效和协调一致地实施这项纲领,而不必为此目的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显然,将需要产生支持纲领所需的政治意愿。我们期待着“发展纲领”成为“和平纲领”的适当补充。

随着在马拉喀什签署《最后文件》并达成设立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的协议,乌拉圭回合便告结束。这是最近国际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尽管它们带来了繁重的义务和挑战,因为这些国家预想现在将出现增加市场机会,甚至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巨大机会。它们还希望,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将提供这样一个长期寻求的保证,即建立一个遵循规则、没有武断专横单方面行动的非歧视性多边贸易体系。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担心执行《最后文件》的过程可能会是缓慢和拖延的。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将大大削弱这份文件的原本意图,使它无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东京回合的经验就是这样。此外,意图给贸易组织的工作方案加上过多社会方面的条款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一眼就可看穿的保护主义行为,而且会使发展中国家丢掉所存无几的相对优势。因此,我们坚决认为,不应该把批准和执行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的进程与那些同制定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制度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的新问题联系起来。所有国家都需要拿出政治意愿,接受相对优势方面的必然转移,而不应把调整的负担转到经济薄弱的国家身上。

如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公平的话,那么人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发展中国家背负沉重外债的问题。尽管主要由于各种免除债务的措施总的债务指数无疑有了好转,但是尤其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外债危机依然存

在。那里的债务比重严重恶化,继续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景。只有通过分担责任和真正伙伴关系的构架内制定着眼于发展的战略,才能找到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因此,有关各方应该采取协调的办法,而不是片面地看待外债的根源。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最优先重视解决这一危机。去年在七国集团东京首脑会议前夕,苏哈托总统采取主动,将一份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备忘录交给该集团主席,要求七国集团就这个问题开展对话。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七国集团当时在东京,后来又于今年7月在那不勒斯再次对不结盟运动作了积极的响应。除其他以外,他在那不勒斯要求巴黎俱乐部开展努力,以改进在债务问题上对最贫困和债务负担最严重国家的待遇,并酌情减少债务总额,增加对面临特殊困难国家的优惠。此外,印度尼西亚最近还主办了不结盟国家关于债务与发展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债务负担最严重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各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除其他以外,通过一套关于今后就债务问题进行谈判的共同原则。其中包括一劳永逸地安排处理未偿还的所有债务,减免所有类别的债务,包括多边债务。我们已将会议的报告提交给秘书长,供大会本届会议在可能时审议。

印度尼西亚坚信各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包括社会发展权利,它坚定致力于积极参加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将于1995年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同样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亚致力于通过一项会议宣言,要求实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把性别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中,并通过一项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方案。

在我们筹备于明年举行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我感到,尽管在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希望受到挫折,但我们即将开启未来之窗。这个未来的确不属于北方或南方国家,也不属于西方或东方国家,而属于全人类。也许智慧的到来总是一个旭日渐近的过程。首先,我们开始认识到,人类不能在与自己为敌的冷战状况下生存;我们的问题是全球性和有全面性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在一种全球伙伴关系中在整体上全面解决。

我们现在应当明白,没有那样一种伙伴关系,我们光明的前途是无法实现的。在我们努力完成《发展纲领》,以

使之与《和平纲领》相配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正在描绘出一个更好的和更加统一的世界的共同理想蓝图的细节。有人讲未来属于那些有远见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但这只有在我们忠实于这种远见、执着地追求它,并进而证明我们不会辜负它的时候才有可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共和国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奇克瓦伊泽先生阁下发言。

奇克瓦伊泽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谨向阿马拉·埃西先生当选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这是对他重要的经验的一种恰当的认可,以及对他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崇高地位的一种敬意。

我还愿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问候和特别的感激之辞,感谢他对我国的各种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和认真考虑,以及他无私地致力于为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和更加理智的世界的事业的精神。格鲁吉亚人民正以极大的期待盼望着他将格鲁吉亚进行的正式访问。

首先,我谨向大会转达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元首、议会主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问候以及对大会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良好祝愿。

自从我有幸代表我国作为联合国的第179个会员国进入这个国际组织并在该讲坛上向大会讲话的那一天起,二年多已经过去了。当时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充满喜悦和庆祝的时刻。

这两年当中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们感到过分乐观和满足。

我国只是在最近才踏上了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艰难征途。它在这种努力当中正遇到许多内部以及外部的困难。尽管我们进行了公正和民主的选举并组成了政府的构架,但整个国家仍继续陷于深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当中。

国际社会已经向格鲁吉亚伸出了援助之手,我谨在此向以下各国政府表示我们的赞赏和感激: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德国、欧洲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和土耳其,以及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这里只列举几个,感谢它们在我国处于艰难时刻的时候所给予的宝贵援助。

应当承认,格鲁吉亚和所有那些最近才转向独立和正常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有其内部原因,因而必须首先由这些国家自己来处理。但让我们暂时先撇开国内方

面并着重看一下国际环境方面,因为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

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一场全面核灾难的危险已经消失,因而整个世界变得不那么危险了,但与此同时它却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料。国家与国际舞台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战后国际关系的体系是适应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地理和其他现实的。其中之一就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具有深刻的认识:即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政权已经被击败。因此,战后的两极体系尽管存在很大缺陷,却总的来讲能够对时代的需要作出反应并且大致保证了我们星球的安全与稳定。

我们这一代目睹了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追随者的崩溃而出现的另一个极权主义政体的瓦解。这导致了国际关系性质方面的深刻变化。时代正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且国际社会目前也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挑战。然而,人类历史--整个时代的这一完结并没有伴随着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从而能够象大约50年前那样符合当代世界的各种现实。国际政治机制以及总的政治思想对这些变化毫无准备,并且它们至今仍继续采用各种权宜的措施。

当今的政治领导人似乎低估了这些变化具有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因而他们无法应付当今的各种问题或对付后世界的各种挑战。国际关系的基础结构、原则、工具和思维方式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形。

包括我国在内的新生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外部方面正在于此。它们正在走向民主社会的道路上尝试着迈出其第一步,而这在一个仍然正从各种变化中恢复的世界里是一条漫长和困难的道路;这个世界却既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所处环境的艰难程度,也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发展对这个世界具有的重要性。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这些国家都能够被描述为“热点”,这是不幸的。这些热点是遍布我们星球的未愈合的伤口。这些开着的伤口急需进行彻底的手术,而国际社会的维持和平活动尽管已经尽其最大努力,但在一些情况下却好象是按处方进行的谨慎治疗。

我作为格鲁吉亚的外交部长也许不应当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存在着欠缺进行抱怨。该组织整体、其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及其特使、瑞士的

布龙纳大使都对我的备受折磨的国家的诸多问题给予了很大重视。安全理事会仅对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问题本身就通过了九项决议,还派出了一些观察团,并且延长了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任务期限。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世界各国人民期待联合国和构成这个组织的会员国作出明确的决定,并采取勇敢、及时的行动。

在此方面,我愿指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大使最近对格鲁吉亚的访问在我国政府看来是多么有益和及时。这次访问也表明柯林顿总统对格鲁吉亚事件所给予的重视。

虽然我不想过多谈论“热点”问题,但是,我国的困境不允许我完全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认为在格鲁吉亚也许正在进行另一种实验,其结果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与主权产生直接影响。

难以描述的是格鲁吉亚民族对国际社会是否能够促进和平解决阿布哈兹冲突所感到的失望和有时候的漠然。

这些感觉在国内导致了一种危险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在议会和人民中间,因为没能解决这一冲突而使免遭肉体消灭的大约30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并且继续生活下去而引起的义愤浪潮正在高涨,尽管这种努力已经进行了一年多。

阿布哈兹冲突的核心是侵略性的分裂主义部队在外来支持的支撑下企图从一个主权国家夺取一块领土,并且在格鲁吉亚这块领土上建立一个基于民族仇恨、不容异己和歧视的地方独裁政权。

我们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希望联合国对我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愿望作出回应。但我们的希望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几乎十多个决议,会员国既找不到资金和军事分遣队,也找不到政治意愿来在格鲁吉亚安排维持和平行动。

因为相信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有可能实现公平解决,所以格鲁吉亚政府一直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主持下真诚地同分裂主义分子进行谈判,同推动者俄罗斯联邦和观察员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进行谈判。结果签署了一些协议,旨在促使流离失所者返回其家园和解决这一冲突。

但是,分裂主义分子一再违背诺言,不履行义务,这一痛苦的回忆证明要期待一个对格鲁吉亚人实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政权采取愿意合作的立场是多么的天真。可

以预测,阿布哈兹分裂主义分子将利用牵强附会的借口继续忽视其根据所签署的协议作出的承诺。

由于对联合国阿布哈兹维持和平行动的希望受到挫折,因此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向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的首脑发出了相同的呼吁。达成了一项决定,并在冲突地区部署了一支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虽然其存在是有益的并给解决冲突带来了希望,但是我们认为它能够更积极一些,不要仅限于使冲突各方脱离接触。

阿布哈兹冲突不是格鲁吉亚一方的问题。相信我,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把我们的问题推给别人。这个冲突对全世界都具有直接和危险的后果。也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世界应该关注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认为,在有人公然企图侵犯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仅仅充当一个外来的旁观者。允许分裂主义在一国内实现其目标将开创一个先例,在全世界引起一连串反应。我们在座的代表中有多少人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国家、人民能够免于这一危险?

最后,高加索是世界上对全球广大地区的稳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影响的地区之一。高加索地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十字路口之一,是东西南北的会合点,是各个大陆、各种文化、利益和战略互相交融的地方。如果高加索的和平与稳定得不到维护,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得到维护。

在这方面,令人悲伤的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它们的分歧。这一冲突也在破坏高加索地区的社会结构,并大大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以及数十万人民的苦难。

我国政府的坚定立场是,阿布哈兹冲突能够而且应该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这需要各方作出大量努力,表现出巧妙的政治家才能,并作出真诚的承诺。

格鲁吉亚政府必须非常仔细地为其多民族和多文化的人民创造一种现代化的、可行的和公平的结构,多少世纪以来,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友谊、稳定和自豪,从未带来紧张或仇恨。最重要的是,格鲁吉亚政府必须为其人民创造一种强大的经济基础,以便防止经济困难带上政治和民族性质。

格鲁吉亚绝不允许丢失任何一部分领土,不仅仅因为

其领土并不广大,而且还因为所拥有的领土,每一平方英寸,都无可争议地属于自己。阿布哈兹分裂主义分子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必须找到政治勇气和意愿,表现出灵活性和远见来举行真诚的谈判,并达成一项公平和持久的解决方案,以便使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的后代能够忘却他们前辈生活中这黑暗的一页,并在友谊与和平中继承他们祖先留下的东西。

俄罗斯联邦积极参与了旨在寻求和平解决阿布哈兹冲突的进程。它对这一和平进程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我们坚信,不管某些政治集团看法如何,作为大国的俄罗斯联邦和作为该国领导人的叶利钦总统确实希望在其南部边界看到一个强大、稳定、主权、团结和友好的格鲁吉亚。任何其他考虑都是不合逻辑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叶利钦总统在几天前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当时说俄罗斯联邦同独立国家联合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善意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总而言之,现在不是考虑过去的错误,而是考虑将来可能性的时候。

格鲁吉亚只是最近才加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正式会员国。然而,这一时期充满了引起我们很大震动和感动的事件。我们认为有义务在几个方面谈一下我们的经历和想法,我们相信这有助于我们未来集体努力的有效性。

我们生活在动乱的时代,是世界上所发生的迅速和不可预测变化的见证人。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政治思想促使现有国际机构适应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似乎连联合国这样的一个代表机构可能也必须对其结构进行一些变革,如果它要在新形势下继续走在事态发展的前面,并且发挥其作为人类议会的作用。

本组织将要实行时代所推动的改革,这一改革和秘书长为进行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大多数会员国的赞同表明时机已到,应开创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时代。

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会员国数目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我们充分支持把安全理事会席位增加到21个,以便反映这种变化的提议。我们还认为,把德国和日本作为候选国家,以便使其成为扩大了的安全理事会的新常任理事国是适当的。这样做除了反映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之外,还将使我们终于能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遗留影响。

我们认为,在考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

国数目的可能性的时候,主要的标准之一应该是会员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参与情况和发挥的作用。尽管我们认为这个考虑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其他方面,如公平的地域代表性,也不应受到忽视。

要完成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全面制度,来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就需要增加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效力。我们和秘书长一样感到担心,作为解决争端的最重要工具的国际法院并没有为此目的得到充分利用。毫无疑问,更有效地利用国际法院将提高联合国促进和加强和平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采取主权行动,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以及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中提出的建议,承认国际法院的普遍管辖权。

当今,为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制度所进行的努力只有在全球和区域各级都加以实行的时候才会有效。我们认为,全球和区域安全制度之间的纽带不足以满足今天的需要,而且保持得杂乱无章。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现在应该缔结一系列特别的“标准”条约,保证更有效地利用和紧密地协调全球和区域安全制度的各自机制,从而提出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更高级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这些条约应该在不损及联合国的规则和规定、《宪章》的各项条款以及各区域制度的规约的情况下,除其他外,规定区域组织代表联合国,并经联合国授权,行使协商和控制的职能。

我们常常在各个国际论坛上讨论对峙结束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具体的挑战。分裂主义,特别是以侵略和极端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分裂主义,是其中最危险的挑战之一,它象痼疾一样正在全世界扩散。我们认为,建立一个法律基础,来遏制侵略性的分裂主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且早就该进行了,以便今后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不会爆发象格鲁吉亚国内那样的局势,或在爆发这种局势时将它们限制在当地,并及时消除。

我们提议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加上明确的规定,在侵略和极端主义的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就将其宣布为非法。越来越明显的是,仅仅重申和确认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是不够的,由于这一原则正在许多情况下被公然抛在一旁,这样做就更为不够了。

这些法律条款还应规定,对诉诸武装斗争和暴力的分

裂主义运动实行严格的军事物资禁运以及迅速的、外科手术式的经济措施,并建立一个机制,以便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即武力。

可以在以下两个方式中选择一个来建立用于这些行动的军事部队:或是建立联合国后备部队,这个选择将导致庞大的财政开支,或是在每个会员国的武装力量中建立训练有素的特别单位,这些单位在需要时可以置于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直接指挥之下,而军事参谋团本身也可以变得更为积极和有活力。

尽管第二个选择在目前似乎更为现实,但我仍然希望强调对这种冲突采取早期预防措施的好处。如果联合国具备较小的和机动的快速反应和部署部队,也许许多这种冲突可以被限制在局部并得到早期解决。可以采用国际自愿方式来组成这些部队,从而强调其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性质。它们可以被迅速部署在冲突地区,并可以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采取行动,保证使冲突各方脱离接触,以便为部署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创造条件。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应在联合国秘书处内部专门成立一个部,其唯一目的是努力解决冲突局势。这样一个部可以由十个具有丰富经验和受到高度尊重的政治人物作为其核心。为了使他们发挥职责,将赋予其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可以在这样一个部里面设立一个特别的单位,来协调快速部署部队的行动。该单位将保证资料和情报数据的收集,从整体来说将作为这些行动的总部发挥职能。这个单位还可以提供关于涉及分裂主义倾向的潜在冲突局势的宝贵的早期预警资料。

自然会出现关于这些部队的筹资的问题,为了事先回答这个问题,我应该说,是的,这些部队无疑将需要更多的财政、物质手段和人力资源。然而,在这里,目的显然成为手段的正当理由。由于我们在过去因经常行动得太迟而已经付出了大得多的代价,国际社会再也承担不起这种奢侈了。

几天前,在这个讲坛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提议,这就是,为了保障和捍卫少数民族的权利,应该在所有会员国的法律中体现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宣言》的各项原则。我们坚决支持向少数民族提供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保证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原则。我们因此想再进一步,提议把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都编纂为法律。

由于每一项权利都以一项责任为前提,我们认为,国际法律文件和各会员国的本国法律迫切需要在列入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列入有关这些少数民族对他们是其一部分的国家所担负的规定的规定。

鉴于当今作为个人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迅速增长的作用,我们认为,也应该考虑为个人在侵犯他人或群体的人权和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负责的问题。因此,我们充分支持以下提议:制订一项关于个人、群体和政治组织的权利和责任的宣言,以便保证公认的自由和人权。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格鲁吉亚支持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职位。

我已经试着概括了我国政府关于它认为鉴于当今在国际环境中发生的许多深刻变化,应该在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中进行的变革的某些意见。尽管这些意见仅仅是某些组成部分,但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和平纲领》和其他文件中已经阐述了关于所需要进行的变革的全面和平衡的设想。执行这些变革将大大有助于消除我们在大会堂中正在讨论的许多问题,并且正象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非常恰当地说的那样,也将非常及时地为整个国际制度“输血”。

本组织的生命中正在出现一个重要的时期。明年将是联合国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年龄,使我们能够评估本组织的许多成就,但也促使我们展望仍然需要进行的工作。

半个世纪的存在和经验赋予本组织以及每个会员国更大的责任。它提出了更为宏大的目标,但也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这些目标之中有些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而其他一些只有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责任是提供一种可继承的财产作为一种踏脚石供人类跃进二十一世纪并安稳地踏上坚实之土。

格鲁吉亚是个一小国,但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它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与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和平友好关系。格鲁吉亚不会是一个国际事件的消极的观察者;它将公平地分担国际社会的责任,并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作出贡献。

下午1时40分散会